

在春节座談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二月)

主席：今天談談教育問題，我看要改变，路线方針是对的，但方向不对头。

主席：不够入伍年齡。还可以过軍隊生活，不仅男青年，女青年还可以办紅色娘子軍过軍隊生活。

主席：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孔子只有六門課程，教出了顏回、曾參等有名人物。学生成天看书，不搞点娱乐不行，應該使学生参加些文娱学习等活动。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古时代的状元出色的沒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詩人都不是状元，出名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檜、柳宗元。韓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子。李白、杜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貫中、蒲松齡等都不是状元。后两个人是清朝的貢生。高尔基只讀过五年小学。弗兰克林发明电，不是传记作家，却是个卖报小孩，瓦特发明蒸汽机，是工人，沒有讀过很多书，明朝皇帝有二个出色的，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做皇帝做的最好，他是个文盲，一字不識；明成祖皇帝做的也不錯，是一个半文盲，識字也不多。但是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讀了很多书。成了純书呆子知識份子，知識分子做皇帝就做不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說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詩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們都是只专不紅亡了国。

現在考試是對待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題，出难题难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的办法，考試制度需要改革，这样搞是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考試可以公开出題，公布，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如对《紅樓夢》的研究，比如教师出二十道題，学生若答上十題，有两道有創造性見解，就可以給一百分，另一个学生二十題全部答了，但都是照书背的很平常，只能給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試我看允許交头接耳，允許冒名頂替，冒名頂替就是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問懂了就有收益，为什么让他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抄一遍也好，教师課讲的不好，應該允許学生打瞌睡，你讲的又臭又长无兴趣，不如打瞌睡，睡了覺可以休息脑筋，养神对身体有好处。

考試搞得太死了，是用敌人的办法，这是毒害青年，我很不贊成，这种考試办法要改。

孔夫子不是这样，孔夫子只教六門課：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顏回，子貢等72賢人。

要叫唱的、画的、文学家、剧作家都分批分期的都下厂下乡，不要住机关。否則写不出好东西，不下去，就不給开飯。

應該下乡，李时珍就是下乡的，祖冲之是自修的，孔夫子也沒有上过大学，出身差，开始是吹鼓手，是职业道士，还做过會計，以后放过牛、馬，放牧羊的，能御，御現在就是司机，御就会开坦克。书是什么？（章士釗說：书、尚书，书看来是历史）还搞历史。

我們把孔子的传统丢了。他学会了六艺，我們的教育中沒有射、御，孔夫子經常被人罵，子路来了后，才“辱声不聞于耳”，看来子路是孔子的保鏢，誰罵就要揍誰。現在的

學制課程，教育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

學制要多样化。

現在是課程多，書多，負擔太重了。

有些課程可以不考，上過就完。如邏輯、語法等課程就不必考試，這些以後用時就可以懂得。等到工作中去體會提高。

這是繁瑣哲學。繁瑣哲學終究是要滅亡的。如“五經注釋”就是已經滅亡了。不論舊中國也好，蘇聯也好，美國也好，土教條洋教條都要走向它們的反面，都要滅亡的。玄奘翻譯的佛經簡單易懂。後來有人把他搞得太多了，就沒人看，讀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列主義的書不能讀得太多，讀幾十本就行了，讀多了就要走到反面，成了教條主義或者修正主義，就會變成書呆子。孔子的教學也有問題，沒有農業，是重工輕農的學生，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這不行。

《關於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的指示》

批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現在全國學解放軍，學大慶，學校也要學解放軍。解放軍好，是政治思想好，也要向全國城市、農業、工業、商業、教育的先進單位學習。

國家工業各部門現有人提議從上至下（即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行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幹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關於地方黨委抓軍事和接班人的講話

（1964年6月16日）

講兩個問題：一是地方黨委抓軍事問題，二是要搞接班人。……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廠……省對軍隊、對民兵過問，你們省委第一書記都是政委。多少年不履行職務，是空頭政委，不抓軍事，一旦發生問題，不幫忙，就會手忙腳亂，不管敵人從哪裏來，要做到有準備，我們的國家就亡不了。各級地方黨委都要抓軍事工作，抓民兵工作。……我們這樣的國家，這樣長的戰線，光靠中央幾百萬解放軍怎麼行呢？不靠，你們就得自己打主意。守土有責，……要打原子彈沒話講，他要打嗎？他丟原子彈，我們走。他們進城，我們也進城，敵人就不敢打原子彈了。我們搞巷戰，總而言之和他斗。

要把民兵很好整頓一下。從組織上、政治上、軍事上整頓。組織上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組織確定下來，有戰士、班、排、連、營、團、師長，而且真正起作用。還有政治工作人員也要組織起來，一旦有事，拿起來就走。有人說，當三個月民兵精神面貌大大不同啦！民兵組織要有組織，有兵有官，要落實。現在許多地方不落實。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實要有政治機構。有政委、教導員、指導員。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壞人，把壞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講清，不論出了什麼大事，不要慌慌張張。你慌張還能打勝仗？打槍、打炮、打原子彈都不要慌張。政治上準備好了，就不慌張了，原子彈打下來無非是見馬克思，自古皆有死，人不信不立，死就

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国人都打死？我看不見得，帝国主义也不会干，他剝削誰呀！……二十年战争，我們不是死了許多人嗎？黃公略、刘胡兰、黃继光，我們沒有死，是剩下来的渣子。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死。×××同志就是閻王招手，他沒有去，现在还活着，軍事上也要准备，要造手留弹、輕武器、炸弹，我們要有准备，和平时期要搞枪，打起仗来再搞就晚了，……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錢，不要枪，打起仗来要靠中国頂住。靠修正主义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們就可以打出去。

总而言之，我們准备打，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不要怕，无非是天下大乱，无非是要死人，人总是要死的，站着死，躺着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还有一半。……对帝国主义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沒劲，有准备，不怕，就有劲。

二、准备后事——接班人問題

帝国主义說我們第一代沒問題，第二代也变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国主义讲的灵不灵？希望讲的不灵，但也可能灵，赫就是第三代出了修正主义嗎！如何防止修正主义？

1. 总要經常观察和教育我們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义，最好稍多一些馬列主义。

2. 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要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也要为世界大多数人服务……沒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書記，也不能当中央書記、中央主席。

3. 要能够团結大多数人，包括以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錯了的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搞阴谋，这种人是客观存在，不然就沒有对立面，就是形而上学。……五个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姆指向另一边，如果都向一边就沒有用了，世界上沒有純的物质，沒有真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还有零点零一，这个道理多数人沒有想通，完全純是沒有的，不純才成为社会，物质自然界，純就不合乎規律，不純是絕对的，純是相对的，这是对立統一，……我們党的历史有五朝領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何仲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張聞天），五朝領袖都是沒有把我們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經驗。

4. 要有民主作风，遇事要与同志商量，充分酝酿，总要听各种意見，反对派意見要讲出来，不要一言堂，人是可以变的，×老不是变了嗎？牛可以馴来犁田，人为什么不可以变？

5. 自己有了錯誤，要自我批評，不要总是自己对，要比較少出錯主意，讲錯話，出坏主意少一点好，三个仗，一个打敗，两个打胜，就比較好，就可以当下去要帮助人家改正錯誤，只要他認真改正了錯誤，就不要老是批評沒个完。

6. 培养接班人的問題……

不要只有自己行，別人什么都不行，好象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党就沒有了，死了张屠夫，就吃帶毛猪！什么人死了也不怕，什么人死了就有很大損失？馬、恩、列、斯不是都死了嗎？还是要繼續革命，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打死、淹死、飞机炸死等等，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蒋介石沒有一点长处还能在台湾呆住？帝国主义就有一点长处？我們就連一点缺点也沒有？扫地是扫不完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也扫不完。

对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廿七日）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与毛远新谈话纪要

（1964年暑假）

（毛远新同志是毛泽民烈士的儿子，哈军工毕业生）

主席：这半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远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主席：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

远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主席：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远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主席：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远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主席：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

睡在你的身边嗎？你們學院揭發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主席接着問學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同志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說开会多、讲课多，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主席：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嗎？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嗎（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課、討論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沒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識也沒有，讲那些东西怎么能听懂？（主席特別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远新天天坚持去）水你已经認識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騎馬嗎？（远新答：不会）当兵不会騎馬不應該，（主席叫远新去学騎馬，主席也經常练习騎馬，还叫秘书、工作人員也去学）

主席：你打过枪嗎？

远新：有四年沒摸了。

主席：現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們解放军還沒打过枪，那有当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較冷，水里比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覺得有点冷，就說：“还是水里舒服些”，主席瞪了远新一眼“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說：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絲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饒命了。我們家里很多人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間派我就滿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毛远新說：我还有点希望吧？）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說：你們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見你能接受嗎？提錯了受得了嗎？冤枉你能受得了嗎？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結人？你要学会和你意見不同的人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是頌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接班人第四条时說：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別人？要让大家說話，不要一个人說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說：这点你已经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評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行了。

以后主席又談到學院的工作，你們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馬列主义嗎？你們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課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毛远新說：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沒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門主課，你們学院應該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學員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业了业，不然軍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給你安排这一課，你們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毛远新說：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沒有？敌人連飯吃都沒有，他的話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作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們

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象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主席又问：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远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的不主动。

主席：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课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制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的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为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没有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未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主席去看科学成就展览，主席说：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意思。接着，主席说：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主席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主席说：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而一的讨论你看了吗？（毛远新说：很少看，看不懂）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主席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的很好。主席又说：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朝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主席：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到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回去告诉你们政委，说是我说的，今后你们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大有好处！

你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懂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起，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了不起和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了的时候，你就要提出他的优

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对犯錯誤的要洗溫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溫水最合适。对犯錯誤的青年人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弄沒了。傅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不过来？开除太简单化。

你在学院里是不是左派？看到一个文件表扬了你，有人捧你并不是好事。象你那樣的青年人要多挨些罵，罵少了不好，什么事都是这样逼出来的。我写×××就是这样逼出来的，如們現在叫我写，我就写不出来。

什么叫先进？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对周围的人要分析。我到那里都想打听，都想交朋友。我們年青人要学辨証法，学会用辨証法分析問題。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別人聪明，但我懂辨証法，会用辨証法分析問題，不明白的問題用辨証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辨証法，这个作用很大。（当談到軍事工程学院先搞二三年，然后再搞二年半工半讀并結合分配时）

主席說：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語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試試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搞三年，要有针对性，也許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

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結合。六年改成三年，这样作以后，步骤稳，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經驗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語言，要讀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讀書不行。黃埔軍校就讀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陸軍大学以后，他們出来尽打败仗，作我們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說話，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級到高級，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照发展順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現在才三千年历史，要是到一万年該怎么讲呢？

尖端理論，包括通过实践証明了的有用的基础理論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証明沒有用的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板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論开始。你們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板田都有辨証法，你們为什么不用？

人認識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才讲心理学，讲神經系統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應該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現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团时的談話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

我們的教育正存在着很多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是教条主义。以教育制度來說，我們現在正在改革。現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課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讀了課本，还是課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別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許多学生不

知道什么是牛、馬、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粟、糜、麦、稷。学生要讀到二十几岁才能讀完大学。学习年限太长，課程太多，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試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笑声）。所以我劝你們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认为它是好的。現在过多改革，还有很多困难，有很多人不同意。目前贊成新方法的少，不贊成的多。这就可能泼了你們的冷水，你們希望看好的，我就来讲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也沒有。比如拿工业方面的地质來說，旧社会給我們留下来的地质学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人，現在就有二十多万人。

大体可以說，搞工业的知識分子比較好些，因为他們接触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純科学的，差一些，但是比文科的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無論学历史的也好，学哲学的也好，学經濟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們最不懂得世界的事情。

我已經說过，我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来一点东西而已。当然我們也学了一点馬列主义，但是光学馬列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我們中国人，比如象我这样的人，开始是对中国的情况并不太了解，知道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还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們研究中国的情况。同你們研究你們的国家情况一样，我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全国解放，整整化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的政策。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那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沒有教师先当教师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习情况，所以，在教育学中有心理学、教育学兩門科学。不懂实际，学不会，学了也不会用。

清华大学有工厂，那是一所理工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識而不做工的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設工厂，不好設什么文学工厂、什么历史工厂、經濟学工厂或者小說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應該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所以比較起来，我国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太少，無論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課堂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間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么哲学学出来沒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邏輯学也是如此，可以讀一遍課文，但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讀邏輯学的时候就不太懂，在运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这里我讲的是邏輯，还有比如文学要学語法，讀的时候也不太懂，要在写作中才能理解語法的用处。人們是按照习惯写文章，按照习惯讲话，不学語法也可以的。我国几千年来就是沒有語法這門科学。但有的人的文章有时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反对学語法。关于介辞学（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是什么介辞学家。我也学过介辞学，但不理解它。你也是先学了介辞学才写文章的么？

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門至几門手艺，那就一輩子会同工人階級处于尖銳的階級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階級把他們当做資產階級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管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官僚主义者階級与工人階級貧下中农，是两个尖銳对立的階級。这些人是已經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什会認識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对《北京师范学院調查材料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学生負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无用。建議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請学生代表討論几次，决定执行。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寶貴而重要的時間啊！現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們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們一勞二白的祖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負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我們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終身！为完成我們伟大的历史使命，我們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輩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得这么多嗎？許多好事坏事你是看不到的，你只能看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負責，人人开口，人人鼓励，人人批評。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巴，就应该讓他們去看，讓他們去說。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們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担負两个責任，一个是吃飯，一个是說話。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說話，就要負起斗争的責任来。

沒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領導，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們来办事，而不是靠一个人在那里办事，不是首长一个人办，群众不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在杭州的一次談話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廿一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論文特輯)我看了三篇文章。你們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上的哲学，难懂，写给誰看？一些

知識分子，什麼吳哈啦，翦伯贊啦，越來越不行了。

現在有個孫達人，寫文章針對翦伯贊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讓步政策”。在農民戰爭之後，地主階級只有反攻倒算，那有什麼讓步？地主階級對太平天國就沒有什麼讓步，義和團先“反清滅洋”，後來變為“扶清滅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國主義打敗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滅天”。《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為什麼有人說他是愛國主義的？無非認為光緒皇帝是個可憐人，和康有為一起開學校、立新軍搞了一些開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體”，好比我們的總路線，那是不能變的。而西學的“體”不能用，民主共和國的“體”也不能用。“天賦人權”、“天演論”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術。當然，“天賦人權”也是一種錯誤思想。什麼天賦人權？還不是人賦人權。我們這些人的權是天賦的？我們的權是老百姓賦予的。首先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賦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麼讓步政策，只有革命勢力對於反動派的讓步，反動派總是反攻倒算的。歷史上每當出現一個新的王朝，因為人民艱苦，沒有東西可拿，就採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輕徭薄賦”的政策對地主階級有利。

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搞幾年，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得那麼多。

南京大學一個學生，農民出身，學歷史，參加了四清以後，寫了一些文章，講到歷史工作者一定要下鄉去，登在南京大學學報上。他作了一個自白，說：我讀了幾年書，腦子裡連一點勞動的影子也沒有了。在這一期南京大學學報上，還登了一篇文章，說道：“本質就是主要矛盾，特別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個話，我也沒說過。現象是看得見的，刺激人們的器官，本質是看不見的、摸不着的，隱藏在現象的背後，只有經過調查研究，才能發現本質，本質如果看得見、摸得着，就不需要科學了。

要逐漸地接觸實際，在農村搞上幾年，學點農業科學、植物學、土壤學、肥料學、細菌學、森林學、水利學，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有點常識也好。

現在這個大學教育，我們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七、八年，廿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地，看不見怎樣做買賣，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給我的孩子說：“你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我爸爸說的讀了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你們來學習。”其實入學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歲，接觸社會很多。二歲學說話，三歲哇喇哇喇跟人家吵架，再大一點就拿小鋤頭挖土，模仿大人勞動。這就是觀察世界。小孩子已經學會了一些概念。狗是個大概念。黑狗、黃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的那條狗就是具體的。人，這個概念，已經舍掉了許多東西，男人女人不見了，大人小人不見了，中國人外國人不見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見了，只剩下了區別其它動物的特點。誰見過“人”？只能見到張三、李四。“房子”的概念，也看不見，只能看到具體的“房子”，天津的洋樓，北京的四合院。

大學教育應當改造。上學的時間不要那麼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學家嗎？能出文學家嗎？能出歷史學家嗎？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臧本禹的文章（指《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写得

好，缺点是沒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評新編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沒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乡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們有实习工厂，有实习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實驗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連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讀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在下面搞三年。教員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嗎？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嗎？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問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們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沒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現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綜合。过去的书都沒讲清楚。說“分析中就有綜合”、“分析和綜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說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說分析和綜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們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們說它統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們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們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們内部有矛盾。我們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沒有大城市，沒有外援，但是我們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軍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軍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能够打仗？我們的元帅、將軍沒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沒有讀过軍事书。讀过《左传》、《資治通鑑》，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沒有了。我們打仗，一本书也不帶，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綜合就是吃掉敌人。我們是怎样綜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軍。武器粮食，各种器材，統統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話說，就是揚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飯也是分析綜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腸胃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們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綜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揚弃。这是从馬克思那里学来的。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們有价值的內核，改造成为唯物辯証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經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馬克思的《資本論》，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們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們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錯誤。

你們沒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閱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沒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县长好。楊献珍、张聞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帮助他們。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沒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那一个阶级沒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沒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給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譯出来看看。罗素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帝，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

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說的行动。

一个人要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們这些人都是学生腔（伯达同志插話：主席除外）我做過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軍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哲学研究工作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統一嗎？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滿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凱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发生分化和斗争。

馬列主义經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較好办，哲学的麻煩，不大好搞。辯証法过去說是三大規律，斯大林說是四大規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的規律，就是矛盾的規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現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統一。

說形式邏輯和辯証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說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邏輯是讲思維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門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对矛盾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罵我們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們說：“国民党是匪徒。蔣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蔣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邏輯的。

用形式邏輯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識的。当然可以推論，但是結論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現在有些人把形式邏輯和辯証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給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1966年5月7日）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軍区，請他們召集軍、师兩級干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适当的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軍隊應該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們不是这样作了嗎？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軍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換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軍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軍学、軍农、軍工、軍民这几項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調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項，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項或二項，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主席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话

开两个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需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不了解，半年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一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争头？李达有多少斗头？翦伯赞出那样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送对联，讲他“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看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要牵引到你的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不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乱的地方去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也没有，搞一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人死吗？左派挨打是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会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半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

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論和通知。（有人提加主席著作）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那个书上有？那个將軍打仗还翻书？現不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轉过来。

文化革命委員，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贊可被右派用，也可以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象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訓練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員會都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不要多，多了他們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現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統統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沒有。市委可搞个收发。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以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沒有用。

有些人沒想想，一不上課，二管飯吃，三要鬧事，鬧事就是革命，工作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們有的部长就那样可靠的？有些部、报館是誰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傾向現成的，有的工作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語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現不好斗嘛！不准打人，叫他們放嘛，貼几张大字报，貼条反动标語怕什么？

給清华大学附中紅卫兵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紅卫兵同志們：

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說的对一切剝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声討，說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热烈地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紅旗”战斗小組說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員工大会上，代表他們紅旗战斗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热烈地支持。在这里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論在北京，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样态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热烈地支持。还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人們。对犯有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后，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无产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請同志們予以注意。

炮 打 司 令 部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

全国第一张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評論員的評論写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

道而行之，他們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執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嗎？

毛 澤 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

（1966年8月12日）

關於第九次大會的問題，恐怕要準備一下。第九次大會什麼時候召集的問題，要準備一下。已經多年了，八大二次會議到後年就十年了。現在要開九次大會，大概是在明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再開。現在要準備，建議委託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來籌備這件事，好不好？

至於這一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的一個重要決定，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的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的那些方針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但這個決定能否實行還要靠我們在座的不在座的領導去做。比如講依靠群眾吧，一種是群眾路線，一種是不實行群眾路線，決不要以為決定上寫了，所有的黨委所有的同志都會實行，總有一部分人不願意實行。可能比過去好一些，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決定，並且這決定有組織的保證，這回組織有些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定以及公報的實行。

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允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允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正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他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少的問題，如果不開這次會，再搞幾個月，我看事情就壞得多。所以這次會議是開得好的，是有效果的。

（此講話系在閉幕會上）

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親愛的同志們：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向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我們祝賀你們的代表大會圓滿成功！

以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光榮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

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紅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盞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鉄托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賊集团，比起你們来，他們都不过是一杯黃土，而你們是聳入云霄的高山。他們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們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階級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現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經或正在改变顏色，实行資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階級专政变成資产階級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頂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們坚持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階級专政。你們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設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輝煌的胜利。你們为无产階級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經驗。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是你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們也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和你們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劍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們之間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誼，經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驗。

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們一边。国际无产階級在我們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們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們一边。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不怕孤立，也絕不会孤立。我們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敗的。

我們現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給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証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階級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覺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它一切害人虫已經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他們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們前进的道路絕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請同志們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們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結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結起来，全世界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結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結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現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沒有帝国主义、沒有資本主义、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乱的問題。采取什么方針？我的意見，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沒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論，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回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現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組，原想开会改組，現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說。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

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說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問題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象就照象，无非是照我們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們的坏話有什么要紧？！

会見大区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时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传达記錄稿）

今天各大区的書記和文革小組的成員都到了，會議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間状态的一些人組成学校文化大革命小組来領導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們懂得。有些工作组搞了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們能斗能改嗎？象翦伯贊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讀，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內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聯絡員，改成顧問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員。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讓他們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嗎？所以西安、南京报館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們这些人呀！你們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館，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說不清，为什么这样？你們不出面，我就出面，說來說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那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到学校看大字报，沒感性知識，那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去，取得感性知識，南京做得比較好，沒有阻挡学生上中央来。（康生同志插話：南京搞了三次大辯論，第一次辯論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辯論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辯論的結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辯論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行。）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戴高帽子游行，辯論的結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間，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問題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們看大字报时，就說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們鬧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傾的話。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識也沒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們包围，你和他們几个人談話，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們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鍛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弃扼簡，錯誤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插話：砍掉三分之二，学习主席語录）政治教材、中央指示、報紙社論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作教条。打人的問題，通知上沒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向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員會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

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通通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行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些部门改成科，没有办。）是呀，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局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有的说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提出要撤销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对青島、长沙、西安問題的批示

（1966年9月7日）

林彪、恩来、××、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

此件已讀*。青島、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組織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人民大学调六百农民进城保郭影秋之外，其他没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外地照办。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見是正确的。

* 指有关青島、长沙、西安問題的报告材料。

在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4日）

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怕红卫兵呢？他们又没有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许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你们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少奇给江渭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信批评他，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吗？（主席问刘澜涛“你们回去打算怎么办？”刘回答：“回去看看再说。”毛主席说：“你们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毛主席问总理会议情况，总理说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毛主席问李井泉：“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怎么样？”李答：“开始不太通，会后一段较好。”主席说：“什么一贯正确，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么。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这次会议改得比较好些，上次会议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个会议有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

年，犯了多少錯誤，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到經驗。一张大字报，一个紅卫兵，一个大串联，誰也沒有料到，連我也沒有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錯誤，主要是我們这些老爷犯了錯誤。（問李先念）你們今天开得怎样？（李答：財經学院要开声討会。我要检查，他們不让我說話。）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說你溜了。（李說：明天我要出国。）你也告訴他們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們不叫你檢討，你們就偏檢討，他們声討，你們就承认錯誤。鬧事是中央鬧起来的，責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責任。我的責任是一、二线。为什么要搞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訓。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当权，每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树立他們的威信，沒想到反面。（××同志說，大权旁落。）这是故意落的，現在倒鬧成独立王国了，許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問題，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否定調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經中央討論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現在，什么事情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先念、譚震林、李富春、×××到南京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馬上答应，四个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會議我不滿，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們开六天，我要开一天都不行。不完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妣妣。遵义會議后，中央比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后，項英新四軍皖南事变，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搞独立王国，那些事都不打招呼。七天后，中央沒有給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陝北，刘少奇、朱德在河北，还比較集中。进城后就分散了，各搞一摊，特別是搞一、二线，就更分散了。五三年財經會議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相互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燾、王明、李立三是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崗、饒漱石、彭德怀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和他們勾結上了，我不知道。彭、陆、罗、楊搞秘密，搞秘密的沒有好結果，犯錯誤路线要改，陈、王、李沒改。（周总理插話李立三思想沒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門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見一致，团結一致就好。要准許刘邓革命，允許改。你們說我是合稀泥，我就是要合稀泥的人，七大的时，陈其源說，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人选为中央委員，王明和其它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員了，現在只走了王明，其它都在么。洛甫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崗一战他是贊成的。宁都會議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們不同意，遵义會議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沒有他們不行。洛甫是頑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們的，聶荣臻也是反对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概抹煞，他們有錯誤就改么，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會議是我建議召开的，時間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沒料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紅卫兵、一个大串連，就鬧起来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們出身都好嗎？不要招降納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几个右派，那怎么行呢？那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們就是調查研究么！了解他們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門上，我特意把李宗仁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組織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黨員很多，翦伯贊、吳晗、李达都是黨員，都那么好嗎？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陆、罗、楊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紅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沒有共产党，是孙中山起来領着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誕生一百周年，怎么紀念？那要和紅卫兵商量

一下，还要开紀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康生同志插話，八大政治报告是有阶级熄灭論的）报告我們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們两个負責。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志們的思想，把會議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鬧就讓他們鬧去。我們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象林彪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还不是阶级斗争？！

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搞好工作，誰会打倒你們？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有：（1）地区的，如甘肃汪鋒；（2）部門，地质部何长工；（3）个人，薄一波、李范五。

×

×

×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書記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聶荣臻說：这个人很懶。）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間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的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鋒，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的四类干部（右派）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总理說：現在已經大大超过了）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調到別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書記搞生产，其余五个書記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聶元梓現在怎么样？（康生說：还是要保。李先念說：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对。

（談到大串联問題时，总理說：需要有准备地进行）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沒飯吃！

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們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对書記处讲了，書記处沒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講話

（1966年10月25日）

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現在看来不那么好，結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好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許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別人的威信，以便我見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贊成我这个意見。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好，有些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責任，不能完全怪他們。为什么說我有責任呢？

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議的，再嘛，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闹了一个大祸，就是批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闹了这么个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奇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经过两个月，有了经验，好一点了。这次会议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利了。只有五个月，运动可能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

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路也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总结经验搞了二十八年嘛。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嘛，所以不能要求同志都那么理解，去年批判吴晗文章，许多同志不想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不全面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引起注意，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赶快总结经验，作政治思想工作。为什么两个月以后，又开了这个会，就是总结经验，作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也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要开十几天会，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以为所有都能讲清楚，有人说：“原则通了，碰到具体问题处理不好。”原来我想不通，原则问题搞通了，具体问题还不好处理？现在看来还有点道理，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上次开会回去，有些地方没有来得及很好开会，十个书记就有七、八个搞接待，红卫兵一冲就冲乱了，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也没有准备回答问题，以后几十分钟话一讲表示欢迎就行了。人家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被动了，这个被动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所以我对这次会议，信心增强了，不知你们怎么样？如果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让一派红卫兵对立，让另一派红卫兵保驾，（疑此处有遗漏）。我看会改变，情况会好转。当然不能过多地要求，中央局、省、地、县广大干部全部都那么豁然贯通，不一定，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通，有少数人，是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多数讲得通的。

讲二件事。

第一件事讲历史，十七年来一线二线，不统一，别人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第二件事，五个月文化大革命，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与二十八年民主革命和十七年社会主义比起来，只有五个月，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通！你们过去只搞工业、农业、交通，就是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外交部也一样，军委也一样。你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对李雪峰讲：“没有想到我

們老前輩为什么怕紅卫兵？”还有伍修权四个孩子分成四派，有的同学到他家里来，有时来好几十个，有好处，我看小接触很有好处。大接触一百五十万，几个钟头就接触完了，也是一种方法，各有各的作用。

这次會議簡报很少，我几乎全部都看了，你們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們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時間太短。有的同志說：“不是有心犯錯誤，是糊里糊涂犯了錯誤。”可以原諒。也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他們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中央也沒有管好。時間太短，新的問題，沒有思想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我看十七天會議后可以好一些。

还有哪个讲：今天就完了！散会。

对中央首长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日）

五·二五聶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們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給他爸爸貼大字报，說爸爸忘了过去，沒有給我們讲毛泽东思想，而是問我們在学校的成绩，好的給奖励。）

（毛主席叫陈伯达同志轉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向中央首长：）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揮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門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鎮压学生运动。誰去鎮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軍閥。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說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走资产階級路线，为资产階級服务。团中央应当站在学生这边，可是它站在鎮压学生那边。誰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貼出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許，这是方向錯誤，赶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們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現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反对，特别是（反对）资产階級“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鬧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黨員負責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从这方面鍛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边。有些同志斗別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們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放不放？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們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是不行的。

給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納入正軌”，其实納入邪軌。

有些学校給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样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毛主席說：）

怕什么。坏人来了証明是坏人，好人来了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来一个敢字。要最后証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你們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对接待外地革命师生政治軍事计划的指示

(1966年11月)

由軍隊負責，將外地來京革命師生，按解放軍編制編組或班、排、連、營、團、師。編好的，進行訓練，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同志和周總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學習編隊隊形，學習列隊基本動作，學習步法，每個人都要學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師生有秩序地接受檢閱。

對軍事學院的講話

軍事院校辦得一塌糊塗，正在整理，過去沒有軍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沒有軍事學校，我們的軍隊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識字和小学程度的。國民黨盡辦軍事學校，什麼陸軍大學畢業，就是我們這些不識字的兵打倒了它。

進軍事學校的時間太長了，蔣介石辦的黃埔軍校，兩個月入伍訓練，四個月學校畢業。蔣介石的軍隊主要還是這些人還比較能打，陸軍大學畢業的實在不能打。

書可以讀一點，但是讀多了害人，的確害人。是革命鬥爭培養幹部。戰場就是學校，軍事學校不怎麼高明。有些現代科學需要長一些時間學，例如導彈、原子彈，這是講研究製造，單武器的使用和訓練，士兵不需要很長的時間。訓練炮兵要一個月就行。訓練駕駛員、飛行員幾個月就夠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戰場上訓練，和平時期要在黑夜里練習，戰爭時期戰鬥就是學習。

在元旦祝酒時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元旦祝酒時，主席對幹部說：“祝你們明年過社會主義關。”

(據北大傳單張春橋同志一月十七日傳達)

关于陶鑄問題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陶鑄問題很严重，陶鑄是邓小平介紹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說还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紅卫兵接見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鑄安排的。

(有人插話：陶鑄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見都讲，說来京都想見毛主席，很好，我想毛主席一定会見你們的，今年不見，明年一定見。用这个来将毛主席的軍，搞两面手法，自己落好。)

陶鑄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門。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紅卫兵一来就能管了。

(有人插話：陶鑄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

在中南区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沒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們开会能把陶鑄揪出来才好呢！

(根据斗争彭、罗、陆、楊筹备处所听总理办公室電話记录传达)

关于《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 对中央文革同志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

《文汇报》現由左派夺了权，四日造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紅卫兵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选登。

《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轉載，电台可广播。內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写綜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許多紙报我說封了好。但报总是要出的，問題是由什么人来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鑄换了吴冷西，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人民日报》过去騙人，又未发表声明。

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我們报纸要轉載紅卫兵文章，他們写得很好，我們的文章死得很。

中宣部我說可以不要，要那么多人吃飯，不干事，而且干坏事，要它干什么？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們中央文革大概也管不了，我也管不了，誰来管？我看紅卫兵来管。紅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

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問題，是全国性的問題。

（有人反映：有些地方左派有些困难。）

革命就是从困难中斗出来的。現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們搞革命从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那有經費、印刷厂、自行車？我們搞報紙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

（有人反映：罢官問題。）

我們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統統搞得那么干淨，我历来就不贊成（有人反映：吳冷西他們現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吳舒服了。我不主张把他們都罢官，留在工作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們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馬列主义。年青时連《共产党宣言》都沒看过，以后才逐渐接触到馬列主义。人的認識是随着实践而增长。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脫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階級斗争。

（有人說：右派讲：“离开我們干不好。”）

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讲话時間，有說九日，也有說七日的）

（据新华社紅色新聞兵纵队传单）

对文化大革命的四点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今年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紅旗》、《人民日报》元旦社論，展开全面的階級斗争。

二、要抓住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主要責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一說：要超过一半以上）

三、上海很有希望，許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四、紅卫兵要向解放軍学习，一定要艰苦朴素。

（据北大传单，张春桥同志17日传达）

“要节约鬧革命。”

（录于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論）

我們是无产階級，斗争要文明一点，为什么要把封建的东西搬出来？

（一月二十二日。据《清华井冈山》传单）

对张春桥同志从上海来电請示夺权問題的答复

（一九六七年一月）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別人夺过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沒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

（据792部队《风雷激》宣传組传单）

关于我駐外人員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最近指示：我駐外人員三分之二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据后勤部传达）

对林彪同志《給〈解放軍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

同意，这样答复好，退林彪。

附：林彪同志《給〈解放軍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

同志們：

《解放軍报》社由萧力、方撫时、孙浩刚、李志高、宋玉芬、武将、楊秉文、刘福山等八同志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报社內部点起了革命火焰。你們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們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地支持你們！

“乱”不要紧，“乱”然后才能治。

《解放軍报》非常需要革命。只有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报纸才能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了照顾人民解放军的威信，照顾国际影响，对于《解放軍报》要采取“内批外帮”的方针。在报社內部革命烈火燃烧的越旺越好。但形式上不能采取《文汇报》、《解放日报》的作法，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解放軍报》社的革命造反宣言、告全军书之类的东西。以胡痴为首的小集团要那样做，完全是个阴谋，对于这个阴谋，必须揭穿。对胡痴等人，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报纸的社论、评论，责成总政萧华同志和关锋同志负责。重要的社论送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审阅。

《解放軍报》是保护单位之一，你们要耐心说服学生和其它机关干部，不要到办公大楼上去。你们可以在办公大楼外边设接待站，接待来访的学生和干部，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欢迎他们送大字报，劝说他们不要到《解放軍报》社揪人，要相信报社的同志自己可以把革命搞好。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林彪

一月十七日

（据测绘学院传单）

关 心 夺 权 问 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

毛主席問周总理：夺权怎么样？公安局是专政机关。

总理：才夺一天多。（按：编者了解，北京市公安局于一月十七日进行夺权）

主席：要抓典型。

总理：市、局委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

- (1) 受黑帮影响很深，变黑帮。
- (2)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3) 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4) 承认錯誤，但还有严重錯誤。
- (5) 有个别一般錯誤（这样人为多）。

主席：前两种面要划小，孤立打击最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五种形式：

- (1) 全部改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
- (2) 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查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
- (3) 停职留用。
- (4) 撤职留用。
- (5) 撤职查办。

总理：那种办法好，撤职一面斗争，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就可以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指革命造反派）也很被动。留用一面斗争，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的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就休息，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陷于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革命造反派要掌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接管是个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是个革命。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方法，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員怎么办）。现在夺了权，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看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

（据二二〇七工厂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传单）

毛主席昨天说过，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支持我管。主席还讲，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取了的政府，这就容易产生保留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东西。

（录于谢富治副总理1月27日在公安部讲话，据工业学院传单）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录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3日)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录于《新北大》校刊)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如材料送到军队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在这次运动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这时主席引用了《战国策》上的“触詔说赵太后”）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左派，然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按一說：交权后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总理于一月二十七日传达（据装工院四野造反团东风战斗组传单）

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

一、我认为××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先有后。

二、地方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

三、現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們文化大革命繼續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鎮压学生，新疆边境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調动，凡是前线大軍区要有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軍区。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一月二十七日由軍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传达）

对《中央軍委命令》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对广播系統夺权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一月）

广播局的同志夺了权，把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这很好。听说内部有分裂，应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凡是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最后都是搞不成的。

（一月二十三日据測繪学院传单）

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爭吵；还有广播系统的革命派（一说：还有广播学院的革命組織），掌了权，又分裂（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

（一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在“四台”的座谈会上，传达了主席指示，据工业学院传单）

批准真正革命的外国朋友

可以参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一月）

毛主席最近指示，外国朋友中真正革命的可以参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中央文革接待站李××接見外国革命朋友的讲话传单）

附：外国专家局来自五大洲的革命造反組織

到中央文革接待站的情况

外国专家局来自五大洲的革命家最近成立了“毛泽东思想造反团”“白求恩——延安”“日中友誼战斗队”等革命組織。一月二十八日上午他们前往中央文革接待站递交给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信，并举行了热烈、隆重的誓师大会。革命的外国专家代表发表了热情激昂的、充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讲话，表达了对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以及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决心，他们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遍全世界。会中，革命的外国朋友和在场的我国革命群

众不断振臂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苏修！”“打倒柯西金！”“打倒勃列日涅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革命口号。会后，共同高唱“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毛主席语录歌等革命歌曲，同时在长安街举行了游行，并散发了“给毛泽东同志的致敬信”的传单。

× × ×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考虑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住。如何，请酌定。

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四个美国人所写的一张大字报，主席的批示

（据《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传单）

最新指示

（1967年2月）

（张春桥在上海群众大会上传达）

2月12~18日，毛主席请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到北京，在一个星期中毛主席接见了三次。张、姚还没有到机场，毛主席就问他们来了没有，机场的同志说马上就到。主席在门口等着他们，他们一到，主席就问：“（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怎样？他们上这里告你们的状。”

一、三结合问题

主席讲，夺权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的问题也不大，内蒙问题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有53%是革命群众，27%是部队，20%是机关干部。上海应该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毛主席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上海市人委机关向国务院总理勒令，要把所有的“长”都取消，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这是谁搞的？现在都不愿叫××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主席说：湖南有一个口号：“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都要改变”。这是反动口号。

二、关于上海人民公社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成立以来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如果全国都成立人民公社，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改名？改的话，就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人家承认你们吗？苏联就可能不承认我们，英法倒可能承认我们。改了后，驻各国大使怎么办？等等一系列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许多地方都向中央申请成立人民公社，中央有公文，除上海人民公社外，其他地方都不准搞人民公社。主席建议：上海还是改一下，改成革命委员会，或者还是改成市委、市人委。主席说：公社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手软了一些，有人向我告状，公安局抓人前门进后门出。

主席说：学校的权力机构可为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三、关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注）

主席说：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有造反派的气派。最后一点说：“将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一次炮轰张春桥的大会开的话，一定要采取必要措施抓人。

四、有几笔賬以后要算

- (一) 市人委机关向总理勒令;
- (二) 紅革会問題;
- (三) 广革会反对电台軍管;
- (四) 龙华机场反对軍管。

五

(1) 现在很多人用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这条語录是毛主席在1919年讲的，自己也記不全了，以后不要用了。

(2) 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頑固分子”，还是提“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 主席問：“同济大学的学生是否还在車站、碼頭？”张春桥同志回答：“还在。”主席又問：“你們来的时候是否还在？”张答：“还在。”主席說：“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結合沒有真正結合，现在才是真正結合了。”

(4) 刘少奇的“論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馬克思主义的。現在我們的斗争方法要高明些，不要，不能老是“砸烂×××狗头”、“打倒×××”，我看大学生应该很好研究一下，选几段写写文章批判。

(5) 文艺界也要回原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

(6) 《文汇报》搞的很好。很同意他們对斗里弄干部的观点，我支持他們。张春桥同志說：“文汇报压力很大”，毛主席說：“要支持他們。”

(摘自《复旦三司》十五期)

(注)：上海‘紅革会’几个头头阴谋在1月30日在上海人民广场开大会炮轰张春桥，后慑于中央文革紧急指示未敢蠢动。但这些家伙仍不悔悟，竟大肆散布謠言，什么“中央文革指示是假的”，什么“中央文革成員只有王力在北京”，什么“张春桥欺騙中央”，甚至叫囂“中央文革电报是大毒草，要批判”。这是一股反对一月革命的逆风。

清华大学无609班轉抄 1967年2月28日

政法公社《扫残云》战斗队 1967年2月28日

人印厂《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翻印

1967年3月4日

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

(記錄要点)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同志們：

你們好。

今年三月下旬，就是一百天以前，我在这里同党內的同志們讲过一次話。那时我是来点火的。这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內，时局有很大的变化，人民的觉悟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就是打了仗嘛。当时我們是料到这些事情的，我在这里就讲过，不过当时沒有讲烧火这句

話，而是說人家批評，我們要硬着頭皮听，听一个时期以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說的對的就接受，說得不對就加以批評。我們总要相信多數人是好人。全世界也好，中國六億人口也好，共產黨也好，共青團也好，民主黨派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工商界也好，學生也好，工人、農民也好，（工人、農民是我們的基本群眾）。多數人都是好人。他們的心都是善良的，是誠實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別有用心的。所謂多數人，不是51%，而是90%以上。譬如這一次，以學生來說，北京大學有七千多人，教授與學生一起，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麼叫一、二、三呢？就是堅決的骨幹分子1%，只有70幾個人。經常鬧得天翻地覆的始終只有50幾個人，還不到1%。他們組織小團體，什麼“百花學社”、“愛智者學社”、“黑格爾——恩格斯學社”、“孔夫子——毛澤東學社”，後來覺得還是不大妥當，還是叫“百花學社”。學生的“領袖”叫譚天榮，現在是全國有名人物了。這回可出了些英雄！左派、右派都出了英雄。

放火燒身，可不容易。聽說你們這個地方有些人後悔了，沒有放得厲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就是有點不夠。有點不過癮。早知這麼妙，何不大開放？讓那些毒草長出來，讓那些牛鬼蛇神出來，怕它幹什麼呢？那時，我們講不要怕，可是我們黨內有一些同志，如陳其通等，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就是怕天下大亂。就是沒有看見這個大局面，就是沒有估計到大多數人，90%是好人，他們是跟我們一塊兒的，用不到怕。他們可以罵我們，但是他們不要打我們，他們用口罵但是不用拳頭打。至於那些極少數的人，比如剛才講北京大學學生中1%不到的右派骨幹分子，另外還有1~2%跟他們拍拍掌，擁護他們的。教授、付教授中間，情況就不同一些，大概有10%左右的右派，有10%左右是左派，這兩方面旗鼓相當，中間派占80%左右。對這些中間派，我們不要怕。我們有一些同志怕房子塌下來，又怕天塌下來。從古以來只有少數人怕天塌下來，就是河南的“杞人憂天”，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不怕天塌下來。90%的人是我們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怕群眾是沒有道理的。什麼叫領導人物？小組長、班長、學校里的校長、教授、助教、講師、黨委書記、黨委委員、支部書記，包括我們在內，都是領導人物。我們這些人，總有一點政治資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點事。現在把火放起來燒，就是要把我們燒好。我們每個人都有點毛病，包括我在內。“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所以要定期放火。以後我看至少是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個五年計劃里头至少放火燒二次。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头一鍛煉，不是就更好了嗎。我們不是講要鍛煉嗎？鍛，是打鐵，煉，是高煉里面煉鐵，平爐里面煉鋼，煉出來的鋼還要鍛。那個汽錘可厲害！我在蘇聯看過5千噸的汽錘，1萬噸的汽錘。我們這些人也要鍛煉。人人都說要鍛煉一番，平時講鍛煉舒服得很。“我有缺點，很想去鍛煉一下。”但真正要鍛煉，他就不干了。這一回應該鍛煉一番了。雖不是萬噸汽錘，至少也有5千噸吧！一個時期天昏地黑，日月無光。這是二股風，一個是大多數好人的批評，我們是歡迎的，他們批評共產黨的缺點，要共產黨改。另外，有極少數的右派，他們是向我們進攻的。多數人的進攻是應該的攻得對，這是一種鍛煉。右派的進攻對我們來說，也是一種鍛煉。真正講鍛煉，還是要感謝右派的進攻。對於我們黨，對於廣大群眾、各民主黨派、青年學生、工人階級、農民，右派對我們的教育最大。對這些右派，現在我們是“圍剿”每個城市都有一些右派，他們是要打倒我們的。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六億人民的革命，一個黨怎麼革得起來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的事業。他們

要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一。第二，走什麼方向，走社會主義，還是走資本主義這個方向？第三，要搞社會主義，誰來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那麼多，先鋒隊是共產黨，資產階級也有一群，它也組織政黨。是共產黨領導，還是右派領導？共產黨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說要，右派說不要。我看在3個問題上進行一場大辯論，很好。革命對不對？建設對不對？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不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這是第一個問題。現在不是展開大辯論嗎？這個問題是沒有辯論過的。民主革命是經過長期的辯論的。民主革命從清朝的末年起經過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凱，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一直是在辯論的（抗日戰爭時，要不要抗日？也經過辯論的，一派說不能對抗，因為中國的槍不夠，這是唯武器論。另一派說，不怕，還是人為主，武器不如人，我們還是可以打）以後重慶談判，舊政協，南京的談判這都是辯論。蔣世石一刻都不停地要打，打的結果是他輸了。所以，那一場民主革命是經過辯論的。是經過長時期精神準備的。社會主義革命是短促突擊，在六、七年之內，在社會制度方面的改革已基本上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還差。社會主義改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單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築，就是政府、政權機關、意識形態。比如報紙是屬於意識形態的。有人說，報紙沒有階級性，報紙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句話講得不對了。至少在這幾十年內，全世界帝國主義沒有消滅以前，這樣講是不好的。報紙以及別的東西，如哲學，各種意識形態，它們都是反映階級關係的。學校，教育事業，文學藝術，都是意識形態，上層建築。自然科學分兩部分，純自然科學，它是不分階級的，但是利用自然科學，誰利用自然科學，這是有階級性的。北京大學“百花學社”的首領譚天榮，他就是物理系四年級學生。現在講物理學的人唯心論可多啦！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唯心論也最多。你們不要以為只是這一些，社會科學這一方面，哲學、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唯心論也多，而且自然科學裡頭也有許多唯心論，他們的世界觀是唯心的。你要說水是什麼東西構成的，那他是唯物論，水是兩種元素構成的，他是照實際情形辦事的。你講社會怎麼改造，共產黨怎麼整風，他就要滅掉共產黨。我們說要整好共產黨。他說要消滅共產黨。當時我們的政策是這樣的，就是只聽不說，在幾個星期內，硬著頭皮，但把耳朵扯長一些，自己一句不說，我們也不通知黨委，也不通知支部書記，也不通知支部幹事會，也不通知團委，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清華大學黨委會內就有敵人，你這裡一開會，他就報告敵人了，叫做“起義”分子。共產黨員“起義”這一件事，兩方面都高興。北京大學學生黨員裡頭崩潰了5%，團內崩潰得多一點，也許10%，或者還多一些。這些崩潰我說是天公地道。10%也好，20%也好，30%也好40%也好，總而言之，崩潰了，我們高興就是了。那種資產階級思想，唯心論，鑽進共產黨、共青團，名為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反共產主義，或者是搖擺分子。他們“起義”，我們高興，不要我們清理，他自己跑出去了。敵人方面，亦很高興。我們把右派一包圍，事情就反過來了，許多跟右派有聯繫，但並非右派的人來揭露他，不是起義了嗎？還有一些右派也要起義的。現在右派不好混了。

幾個月前我這裡講話，到今天不到一百天，時局起這麼大的變化。這個鬥爭主要是政治鬥爭，鬥爭的性質是階級鬥爭。有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這一次主要是政治鬥爭，不是軍事鬥爭，不是經濟鬥爭。思想鬥爭成分有沒有？有，但政治鬥爭占主要的成分。思想鬥爭還有下一階段，要和風細雨，共產黨整風，青年團員也整風，經過思想鬥爭，提高一

步，真正学习馬列主义，真正的互相帮助。主观主义有没有？官僚主义有没有？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就把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斗争还要个把月。右派分子尽是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不好办事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了，右派就是那么多。登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变成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七月，是反右派紧张的一个月，过了七月到了八月，就要和风细雨了。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而我们是主张和风细雨的。他们说共产党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即使我们从前搞的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在内，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地前进的。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对右派，要挖，现在还要挖，不能松劲。这个时候的右派，那里有一根草，他就想抓了，因为他要沉下去了。现在他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以前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说和风细雨，天天下黄梅雨，秧苗烂掉了，粮食就没有了，就要闹灾，不如急风暴雨简便。现在是夏季，是暴雨天，到了8月，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可挖了。

我们中国历来受到两方面的教育，正面的教育跟反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又是第一个大好“教员”，从前有清朝、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以后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教员不够。我们有許多话，許多中间人士不听，要另搞一套。譬如“团结一批评一团结”，他就不听。譬如讲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又不听。譬如讲民主集中制，他又不听。讲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又不听。讲要联合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爱好和平的各国的人民，他又不听。还有一条，他特别不听，就是说“毒草要除掉”。牛鬼蛇神让他出来，让大家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认为这些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长出来，就要锄，农民每年都锄草，锄掉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可是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锄草，就是跟它讲话，可是草根本不听的，它明年还要长。锄了一万年，一万年还要长，一万年，年年要长草，认为毒草是我们，他自己是香花。因此，他并非被锄之列。他要把我们锄掉，他就没有想到他正是应该锄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急促。总路线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没有辩论，党内没有辩论，社会上也没有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们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经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都基本上改了，但是没有展开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展开辩论。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要传下去。你看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传下来了，《十五贯》也传下来了，大字报我看也要传。譬如讲，工厂里整风。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如果是一万张，那是头等，如果是五千张，就是二等，如果只有二千张，就是三等，如果稀稀拉拉的只有几张，吃了等。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白话文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也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也有话剧，资产阶级也有话剧，汉奸也有话剧，抗日时期也有话剧。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并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象是利于资产阶级。所谓一个时候，是二个星期、三个星期，只有那么一点。所谓硬着头皮，也就是那么二、三个星期，

睡不着覺，吃不下飯。你不是講要鍛煉嗎？人生在世有幾個星期睡不着覺，吃不下飯就是鍛煉，並非真的把你送到高爐里去燒。有許多中間人士動搖一下，這也很好，動搖一下，他得到經驗，中間派的特点就是動搖，不然為什麼叫中間派？一頭是無產階級，另一頭是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中間派。二頭小，中間大，但是歸根結蒂中間派都是好人，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資產階級想爭取他們做同盟軍，一個時候有點象。無產階級想爭取他們做同盟軍，一個時候也有點象，中間派也批評我們，但是是好心的批評。右派的批評是借着這個事來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剛才講大字報，是方式的問題，是作戰的武器之一，象步槍、短槍、機關槍，是輕武器，象文匯、光明日報，還有些別的報紙，是飛機大炮。光明日報，文匯報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過去他們不知道什麼是無產階級報紙，什麼是資產階級報紙；什麼叫社會主義報紙，什麼叫資本主義報紙，分不清楚。一個時候即使分得清楚，可是這些報紙的領導人要把它辦成一個資產階級報紙。他們仇恨無產階級報紙，仇恨社會主義報紙。一個學校把學生引導到社會主義方向還是把學生領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工商界還是把這些工商業者（大、中、小資本家）引向無產階級方向，還是把他們引向資產階級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害怕這個改造，說改造就有那麼一陣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 shouldn't 這麼解釋。應該是越改造越自尊，應該說是自尊心，因為自己有覺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認為有很高的階級覺悟，認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無產階級，要按照他們的面貌來改造這個世界，而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目來改造。我看多數人，90%以上是願意改造的，當然，中間要經過躊躇、考慮，不斷猶豫、搖擺的過程。越改造他就越覺得要改造。共產黨整風就是改造。將來還要整風，三年一整，五年再整。你說整了這一次風就不整了，難道整了這次風，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只要過了二、三年，他都忘記了，官僚主義又來了。人就是容易忘記。所以過了一個時候還要整。資產階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難道就不要整風？不要改造？你說不要改造，調個名字，叫整風也可以。現在各民主黨派不在整風嗎？整個社會整整風，為什麼不好？

現在民主黨派是整路線問題，整資產階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我看整得對了。共產黨不是路線問題，而是作風問題。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的是走那一條路，是走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條路線，還是走什麼路線？首先要把它這個問題搞清楚。這三個問題要搞清楚：革命的成績，建設的成績問題，幾億人民做的事，究竟做得好不好？將來的方向，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要走社會主義的話，那末要受那一個黨的領導，還是要章、羅同盟來領導，還是要共產黨來領導？來它一個大辯論，把路線搞清楚。共產黨內也有一個路線問題，就是那些“起義分子”。那些“起義分子”是共產黨、青年團里的右派，對他們來說這是個路線問題。教條主義現在不是個路線問題，因為他沒有形成路線，我們歷史上有一次教條主義是形成路線的，因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綱領。現在的教條主義沒有形成制度、政策、綱領，他是有那麼一些硬性的東西。現在打上一錘子，火這麼一燒，他也軟了一點。各個機關里頭、學校里頭、工廠里頭不是在講下樓嗎？不要國民黨作風，老爺習氣，合作社主任下田同群眾一起耕田，工廠的廠長、黨委書記到車間里頭去，這樣官僚主義就大為減少。出大字報、開會，開座談會，把應該改正的，應該批評的問題，分類來解決。再學點馬克思主義，提高一步。

我們中國民族，是個好民族。這個民族是很講道理的，很熱情的，很聰明的，很勇敢

的。我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既集中統一，又是生动活泼，有民主，又有集中，有自由，又有紀律。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要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应该提倡讲，应该生动活泼。对大多数人是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样尖锐，怎么样痛罵一頓，也沒有罪，不受整，不給穿“小鞋”。“小鞋”要給右派穿。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你們游水不游水？只要100天，每天一小时，不间断地搞，你本来一点不会游水的，保証你学会游水，一不要先生，也不要那个橡皮圈，有了橡皮圈就学不会。人民就象水一样的，打譬方，领导者从各級小組长起一直到我們这些同志，就是象游水的人一样，不要离开水，不要逆那个水，你要順那个水，順着水性。不要去罵群众，群众是不能罵的。不要和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在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錯誤，犯錯誤的时候，要好好讲，他不听，你就等一下，有了机会再讲，就是不要脫离他。等于我們游泳不要脫离水、不要逆水，要順着水性。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識分子是最无知識的。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翘，认为老子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你說这些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可是决定問題的，不可是知識分子而是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就是工人階級决定問題。无产階級領導資产階級？还是資产階級領導无产階級？无产階級領導知識分子？还是知識分子領導无产階級？知識分子应该成为无产階級知識分子，沒有別的路。我說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上海一个資本家讲的，我是引申他的話。他讲的跟我讲的意思不同。他說自己的东西都交出去了，公私合营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說我是資本家？还說我是剝削者？知識分子从旧社会中來，就是吃五张皮的飯。过去知識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資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資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現在是“皮之不存”，皮沒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現在归合作社了；官僚資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資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現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現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時間更要长些，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資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識分子，他們脑筋里老是記着那些东西，做梦也記着。旧軌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要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識分子是无产階級請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資本主义，让你吃飯拿薪水，那工人階級是不干的。知識分子已經喪失了社会經濟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沒有了，現在他除非落在新皮上。現在有些知識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张皮沒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願附在无产階級身上。要附在无产階級身上就要有无产階級思想，要跟无产階級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我們現在劝他們。經過这一場大批評，我看他們多少会覺悟的。我們現在在劝中間状态的人，中間状态的人应该覺悟，尾巴不应该翘得太多。你的知識是有限的，是知識分子，又不是知識分子，叫半知識分子比較妥当。因为你的那个知識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錯誤。你那么多的知識，为什么犯錯誤？为什么动摇？“牆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你为什么动摇？現在不去讲右派的知識分

子，那是根本錯誤的。中間派知識分子也犯錯誤，他犯的錯誤就是動搖，看不清楚方向，一個時候迷失方向，頭腦不清楚，可見你知識不太多。在這個方面知識多的是工人，是農民里頭的過去的半無產階級。他一看就知道，孫大雨這一套東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對，只要談三句話，他就知道不對。用不到寫這麼長的文章。他看誰的知識高？還是那個不識字的人知識高。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是要聽無產階級的。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們這些人要辦什麼事，要決定什麼大計，就非問他們不可，就非到各個地方去跑一跑，跟他們談一談，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們商量，以及跟他們接近的幹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來。北京是什麼東西都不出的，它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農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個加工廠，就是把这些原料製造好，製造不好就要犯錯誤。知識的來源，是出於群眾，歸根到底是群眾路線四個字。什麼叫真正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就是講不要脫離群眾，象魚跟水的關係、游泳者跟水的關係一樣。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孫大雨那些人怎麼辦？打他幾棍子是很必要的。你不打幾棍子他就裝死。追一下，攻一下，攻他几下，是必要的。攻得他想回頭，切實地攻，使得他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爭取他們。因為他們還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大知識分子，這樣的人爭取過來是有用的，多少可以做點事情。而且他們這一回又幫了大忙。給我們當了“教員”。教育了人民。他們是以反面的方法，從反面教育了我們。我們並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里，還是要治病救人。也許有一些人是不願意過來的，他不願意過來那末也好，那就帶到棺材里頭去。孫大雨現在多少年紀？稱他活100歲，還有50年他堅決不改，頑固得很，這個堡壘攻不破，也就算了，盡攻他，我們沒有那麼多的氣力。我們現在要辦事，天天攻，攻他50年，那怎麼了得。有那麼一部分人不肯改，就讓他帶到棺材里面去見閻王，他可以跟閻王說：“我可是有骨氣，我是‘五張皮’的堅持者，我跟這些王八蛋、共產黨、中國人左翼、同廣大群眾作過鬥爭，要我檢討，我都抵抗過來了。”可是現在陰間的閻王也改了，閻王第一個是馬克思，第二個是恩格斯，第三個是列寧。現在分兩個地獄，資本主義世界地獄是老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地獄就是這些人當閻王。我看這些人到閻王那里也是要挨整的。

講得多了，不讲了。謝謝你們聽我這個講話。

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整理

1957年7月10日

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總結發言

一、這次會開得很好，大家都說很好，怎麼樣？太長，很累，成績是主要的，這樣大會，三級幹部，明確方針，交換經驗，統一意志，有幾次會未到，文件要全部看一遍，有的要看兩遍。你們都看完了嗎？大家都要看一遍，這種會要一年開一次，有很好的講演，大國複雜得很，一省每年要開一次三級或四級幹部會議，以後中央要加一些縣委書記和市區書記。雖長、累，還是很好，去年沒有開，吃了虧，鬆了勁，右傾，前年來一個高漲。一年一次有利。各省要開全省性的會議把問題扯清。

二、整風：湖北提出：大膽的放，徹底的放，堅決的放，廣東南方日報寫了社論：要大膽的改，徹底的改，堅決的改，大膽的反，可以不講，上了軌道。有的省市還要放，重

点是改的問題，今年群众創造了一种革命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改、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它的形式，很适合的形式，我們找到了，过去打仗、土改，不能从容辯論，現在許可了，这个形式找到了，事情好办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建設問題也好，都可以用这个形式解决，迅速的解决問題。公开的，而且和右派一道搞，公开登报，不怕出丑。右派要我們下台，党天下也登了嗎？这种形式最适合發揮群众的主动性，扎根串联，打通思想，連队連长給战士盖被子等方式，平等友誼談話，沒有过去的民主作风，不可能有这个三大的形式（大鳴、大放、大爭、大改）。延安整风，写筆記反省，小組会，很多人轉变主观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土改、扎根串連，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的三大（鳴放、爭、改），而且将来还搞和风細雨，商量启发。找到形式以后对事业有好处，可以克服三个主义加命令主义，打人罵人，强迫执行，使領導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很大发展，这是充分發揮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有，要传下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专政不能只靠一个阶级，中国工人又少，必須发动各革命阶层，同貧农、貧苦手工业者，革命知識分子，几亿人民才能巩固专政。

三、农业：四十条修改后，不久可以发出去，請同志們很好的在农村中組織辯論。省、专、县、区、乡、社六級都要规划，注意搞計划，（計划规划一个字），全面规划，全党、社、書記动手加强領導，规划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有的已經作好，有的沒有，是否省、地、县今冬明春或五一前作好，十年规划明年以前六級都要作好，这是指长远的，四十条还要修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有总比沒有好。还有十二年要抓紧，四、五、八可以完成，現在靠精耕細作吃飯，将来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2000斤县不行？（現在潮州一千县），四、五、八将来是否800、1000、2000的目标，还有九、十年，人多还是有飯吃。将来一个人几分地就够了，三亩还多了，当然还要节育，我不是提倡生育。

中央到社各級都要討論，但太多了，分級分批在农村中討論，粮食有底了，真正节约平均400斤就够了，有一家七口人，每人501斤，实际408斤就够了，提倡勤俭持家，根說过去只有富裕中农才能到360斤，要积累，社、家、个人都要积累，提倡勤俭持家。今年应按年景提高积累比例，河南办法除5%的公积公益等外，可搞20%的生产费，包括肥料，修理等，淨产值30亿，扣6亿，又从6亿中扣20%基建，即12,000万元，十年即12亿这些都是建議性质，各省不要一律，不然又說沒有优越性了，管理费应縮小到1%，縮小管理费增加基建，要教育城乡每个人都要有长远打算，要有志气，大吃大喝不算志气，勤俭持家，作几年打算，婚丧鋪排，大办紅白不必要，棺木农民还要，要有习惯，中央火葬不要棺木。省委自己安排，要改变风气，要通过大鳴大放，爭一番，要不要賭錢，只有大鳴大放，經過辯論。十二年规划，还要改一改。老鼠、麻雀、蚊、蝇四害我很注意。韶关地委出了个岐乐社我看全国消灭了，提高文化。全国非常讲卫生，两双筷子吃飯。两年試点，五年突击、三年扫尾巴，人人清洁卫生，大家也要比赛一下，中国要变成四无国，过去是“三无而国”，无政府、无阶级、无家庭。你們不相信家庭会毀弃，不相信非共产主义者，他是生产、消费、教育单位。有合作社不起生产作用了。有托儿所不起教育作用。

人口也是三年試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推行。少数民族，黑龙江、新疆不要推广，計划生育也来一个大鳴大放。我主张中学要上課，如何生，生多少，要生就生，要不生就

不生。能控制自己。

农业綜合問題，綜合計劃很有必要。工商农学的綜合計劃，全有必要，湖北黄安县的經驗很好要推广，领导干部都搞試点，我也想搞。县、区、乡、社干弄一小块地高产，技术就摸底，不搞技术不行，沒有业务不行，工商、农都要搞业务，学成內行，十年計劃，必須精通各种技术业务，都要成为又紅又专。先专后紅不对，还是白。很多是紅則不专。党内右派政治上白，技术上不专，有一些是灰的，有一些是桃紅色的，大紅是左的，单有五星旗不行，是可以学的。科学规划有十年，十年內建立无产阶级专家队伍，斯大林說：干部决定一切，即使技术干部，人家說我們不懂技术不能领导，我們說能，吵还是不能，不懂。各級都要有专家的計劃，都能专起来，成为无产阶级知識分子，大技术队伍，百年树人。减少90年，作10年計劃，十年树人沒有这条，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沒有庞大的无产阶级技术队伍，专家不行。已过了八年，再加十年，实际十八年。还不够，但基本上造成工人专家的队伍。再有十年廿八年，质量加深，基本上达到苏联，四十年的水平，縮短十二年，可以吧？

农业与工业关系：当然应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动摇，此基础上工农同时并举，建成現代化工业，現代化农业，过去单讲工业，不讲农业不行，現在要強調宣传农业。

两种方法：凡事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較快，一种較慢，速度、质量、不要只想一种方法。铁路有几种方案，选一条，几种方法比較，至少两种方法，大鳴大放好，有是小鳴小放好，要大字报，不要大字报，北京卅个大学，开始一个也放不开，用了很多方法，后来压力来了。革命也是有好几种主张，以后选好的。建設方針，也可以用几种方法，建設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东欧都有它們的計劃，可以給我們作参考，苏联的經驗最完全，苏联的办法基本上是好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們不完全，革命有經驗，建設他四十年，他們八年，所謂完全，包括犯錯誤，不会設有錯誤，不犯錯誤不完全。苏联經驗最完全，应提倡学苏联，不学有大損失，我批評教条后，強調学苏联，不吃亏，有利，他錯誤也要研究，可以少走弯路。可比苏更好一些，理由苏在前边。美国人看不起苏联，中国人也看不起的，如龙云，但是卫星还在繞地球轉。

但是否可以避开苏联的弯路，作得更好点，是可能的，因为有苏联，苏联在前边，苏联1913年四百万吨鋼，1921年达到1800万吨，我們可否18年超过1800万吨，到2000万吨，他們的底子是一百万吨，我們的底子是一百万吨，（1949年只19万吨）超过2000万吨也許有可能，要多开小鋼厂，有用处的七、八万吨，十几万吨，中型的30—50万吨的。

去年提了多快好省。有的人說冒了，我們加点限制，本来好省即是限制多快的。口号本身就有限制了，这个会上，多快很多人不敢讲了，实事求是，合乎实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好快多省，我看要恢复。扫掉四十条，扫掉一个促进委员会，促进还是促退？有的促点小退，如600万双鐮犁，总的是前进的。大家沒有要促退的，右派要促退，除四害我是一直坚持的。

資无是主要矛盾，是兴无問題，过去是反帝反封建已完結。現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与資問題，变革小生产制度，合作化，主要是个人与集体，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八大決議并未否定阶级斗争，未否定改造。生产力的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民需要和生产力的矛盾。那时有原因。

二中全会提的資无是主要矛盾，以后如何未提，事实在那里做，因为干的就是这事，

不提也未碍事。三大改造，所有制，今年着重反右。

去年敲鑼打鼓时期，三大改造基本完成，階級斗争緩和了一下。有意識緩和一下。他进攻，資知、富农等，他要刮风，我們搞防林带，两条战线的斗争，整风也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也包括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斗争。挂在資產階級的賬上，几百年后就挂在落后的賬上了。如許多同志同情莫洛托夫，此人和斯大林差不多，相当頑固。苏联內政外交有所改变等，應該欢迎高兴。有一点矛盾，即把斯大林搞的那么臭，那么不象样子，天安門的象下放后有人不滿，挂上后又滿了。关系各国的事嗎？三七开嗎。也許二分一分，成績总过半数。最近赫魯晓夫对斯大林也和我們接近了，去年四、五月中委会決議有所接近。最近赫魯晓夫的文章也有所接近。

另外和平转变也有距离，任何国家有两条，一和平，二战争。我們和蔣介石也是两条，当时如和下来，我們宁願，和平口号可以提出，是防御主动。你要打，我也打。第一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二你要动手老子也要动手。你要打我們当然要打。讲死了，一定和平沒有第二条，就和社会民主党沒有区别，首都一战和平解决，北京、天津、綏远解决。只提和平則不好。二十次大会后沒有讲，一般的还是提两条好。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恐怕苏联同志不大了解。是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是人民內部的百家爭鳴，公开宣布是敌我矛盾，一般的还是不剥夺选举权，实际上是敌人。将来可以讲通的，可能怕我們把毒草都当香花，人民内部总要出毒草。去年緩和半年，右派就大举进攻，我們整风，他們造反，主动，运动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以后可能还要緩和一下，緩和一下就好一些。是否叫右傾，我看不叫。工作和休息，有紧张有緩和，去年人家服服貼貼，敲鑼打鼓，我們不緩和一下不好。我們說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上解决所有制，不是原則上让步。階級斗争存在，我緩和和他斗争，緩和久了，右傾又要起来，假如三年不整，保你还有些人蠢蠢欲动，如自由市場放一下，就有一两万的富翁，如你不搞，保你有右傾。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經常搞，久不搞就忘得差不多了。

振作精神下苦工学习，許多同志不下苦工，要学习馬列主义，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科学，哲学，文学，文学文艺理論也需要懂得，各級干部都要懂一些。

过去新聞学、教育学、文艺刊物民主党派报纸等都不抓，結果就是那里造反，一抓几个月就变了。

下棋、打麻将、看电影、跳舞反对无理由，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县里还有的看白戏，無論如何不准看白戏，公安部应下一个通知。

有的同志八小时下班后，看电影看戏跳舞可以，但主要精力放在这里不对，主要精力应放在学习，养成习惯。

在八屆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8.12.9记录稿整理）

讲些意見，不是結論，決議就是这次會議的結論。

一、人民公社的出現，这是四月成都會議、五月党代大会沒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現，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發現，北戴河會議作了決議。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設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

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們曾經說過，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沒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沒料到，八月才作出決議，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現在整頓組織。

二、保护劳动热情問題：犯錯誤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話，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險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險，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險。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錯誤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錯誤的人90%以上采取耐心說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評就够了。大家議一議，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見，就作为結論。对于严重违法乱紀，脱离群众的干部，約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二、三、四、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們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們。沒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錯誤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針，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抖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沒有对严重违法乱紀的一部分人，經過辯論，区分情节，給以輕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別严重的要做刑事犯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異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異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罵人、押人、捆人，要給予处分。湖北已經撤了一县委第一書記，他在旱情严重时，沒有抗旱，而謊报抗旱。总之处罰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間犯錯誤的人，方針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問題：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會議上我們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說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說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許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內，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鋼，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鋼能說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沒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哩！因此三年內还不能說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1962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鋼，那时也許說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說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說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請同志們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時間长一点，結果時間縮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馬克思主义。沒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們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說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願意当，馬克思尝識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評我。

四、党内外某些爭論問題：圍繞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議論，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議論，有一大堆問題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沒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議論，大体上有几說：一說是性急一点，他們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

高，非常寶貴，但未作歷史分析，形勢分析，國際分析，這些人好處是熱情高，缺點是太急了，紛紛宣布進入全民所有制，兩三年進入共產主義。這次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對着這一方面講的。就是說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沒有好處。有了這個決議，經過這個決議經過幾星期，幾個月，他們在實踐中，辯論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遠會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數幹部思想統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數幹部，他們是好同志，為黨為國，他們認為太急了，他們不是觀潮派，算帳派，不是站在對立面的，他們有顧慮恐怕我們跌跤子，這些人是好人。這個決議也可能說服他們，因為我們並不那末性急。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對付性急的，也給了觀潮派，算帳派以答复，他們是不懷好意的，他們不懂得當前形勢的迫切要求，而且時機已經成熟。

兩個過渡，如何過渡，這兩個月發生了這個問題，發生了很好，就給予答复，這個問題成都會議沒解決，鄭州會議作了些準備，經過一個月，已經成熟。共產主義分兩個階段，從馬克思講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寧十月革命到現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黨搞根據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國勝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說這個問題並不是不成熟的，應該說答复這個問題的條件是成熟了的。現在國內國外對這個問題議論甚多，杜勒斯也在議論，他說我們搞奴隸勞動，破壞家庭，說我們剝削太多了，積累太多，因而建設的速度快，他們剝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間階層、無產階級、共產黨人也都在議論紛紛，各國無產階級、外國同志出來為我們辯護，他們的根據就是北戴河會議和報紙上的消息，我們如不做答复，一大堆混亂思想就會蔓延開來，就會出現很多無政府狀態，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縣，縣管不了社，成為脫韁之馬，所以一方面反對太急，一方面答复這個問題。

五、研究政治經濟問題。在這幾個月內，讀一讀斯大林的《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拿出幾個月時間，各省要組織一下。為了我們的事業，聯系實際來研究經濟理論問題，目前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鄭州會議我曾經提過這個建議，我寫了一封信建議大家研究。

六、研究辯證法問題。鄭州會議時，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體，小自由”，這個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體”，杜勒斯、黃炎培、榮毅仁都會歡迎的。

要抓生產，又要抓生活，兩條腿走路是對立統一的學說，都是屬於辯證法範疇內的。馬克思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一九五八年在我國有很大的發展。例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工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小土群與大洋群，土法與洋法，幾個並舉，還有管理體制——中央統一領導和地方各級分級管理，從中央、省、地、縣、公社，一直到生產隊，都給他一點權，完全無權是不利的。這幾種思想，在我們黨內已經確立了，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並舉的，還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黃石港不是中嗎？有沒有小洋群？也有。還有洋土結合群，總之，複雜得很，這些事在社會主義陣營，有些國家認為是不合法的，不許可的；我們許可，在我們這裡是合法的。許可好还是不許可好？還要看幾年。但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里，啥也沒有，窮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專搞大的太單調，在農業中也是很複雜的，有高產、中產、低產同時存在，實行耕作“三三制”是群眾的創造，北戴河會議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種糧食，三分之一休閒，三分之一種樹，這可能是農業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會主義制度方面，在社會主義階段，有兩種所有制同時存在，是對立又是結合，

是对立的統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說，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說苏联的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許組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應該也可以允許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沒有解决这个問題，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絕對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辯証法的发展。

郑州會議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現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辯証法的推广，武昌會議又提出实事求是，訂計劃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決議，想解决一切問題也不可能。我看这个決議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們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較有根据，比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鋼的問題，明年搞三千万吨鋼，我也贊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問題，忧虑这些鋼誰用，沒有考虑到可能性的問題。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問題。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另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問題，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虛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現在，要把空气压縮一下，把盘子放小—1800~2000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才看，2200~2300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則超过嘛，現在要压縮一下，不一定訂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們的計劃，这也是一个辯証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們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內。提的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1100万吨到2000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沒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結联系起来，在这个問題上不要搶先，現在有些县总是好搶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應該是鞍鋼、撫順、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象样子，有沒有可能也是問題。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識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鋼，我們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們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問題的。赫魯晓夫提出的七年計劃，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應該，一个不可能。即使我們可能先进也不應該[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們都不是学习列宁嗎？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馬克思那里去請賞。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問題犯錯誤，要讲辯証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辯証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問題。

七、郑州會議搞的十五年綱要，这次擱下沒有談，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而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英国的經驗，都不能証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綱要，我們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談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計劃。大概到1962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計劃，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問題也許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會議沒有談，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1958年軍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連队当兵；三是参加

生产；四是大办民兵。但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啦，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東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策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只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说来，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可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离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就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另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8600亿斤，我们讲是七千五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诸公都没有查过。就算有8600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了这高兴的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

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英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变，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二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1927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一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做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说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没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是愿意打的。〔完〕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讲的九条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多谋，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的人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人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有些同志少谋武断，是要不得的。

二、留有余地。这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需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两千斤，这就是没有给下面留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余地。过去我们打仗留预备队，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经济工作不能蛮打蛮攻，生产东西不能都停掉，计划工作就要留余地。保证重点是主要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是按照政策办事情的。

三、波浪式前进。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波，曲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四、要善于观察形势。要经常注意观察政治动态，经济动态。所谓政治动态，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的工作。

五、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一些，就要缩短一点。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六、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舍，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一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是通气的办法。不要满足于书记处办事，更不要对省委书记封锁消息。

七、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权的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去朝廷。

八、要集中。集中在书记处、常委会，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党内一定要造成一种空气，精神要解放，批评要开展，批评就是同志式的帮助。

九、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不准拿出来，拿出来也要顶回去。写文件要通俗，要有口语，要有目的性、观点要明朗，讲话要看对象。鲁迅的《阿Q正传》，写了很多通俗的话。

反对折衷主义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我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到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是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完全是正确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对“政治与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们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衷主义的特点。

折衷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論来代替、冒充偷換馬克思主義的两点論（二点論即一分为二），馬克思主義的两点論在認識事物和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在總結的时候，既肯定成績，又看到缺点；既總結成功的經驗，又總結失敗的教訓。但是馬克思主義者認識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他們看作都是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兩，而是严格地把它們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領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不清）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論。有第一和第二，統帥和被統帥的关系。又如解决实际問題。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問題。

馬克思主義所以坚持重点論，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規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論代替、冒充偷換馬列主義的两点論，就是他把两点論中的重点让偷偷地抽掉了。他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結果就遮盖了事物眞象，模糊了事物本质，使人的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們引到錯誤的路上。

馬克思主義认为政治与軍事、政治与經濟、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統帥，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領軍事、率領經濟、率領业务、率領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了，沒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統帥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們平列起来，就是折衷主义。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或者主张輪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天突出政治，明早突出业务”，“閑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傾向，是錯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論、調和論来代替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結合論。折衷主义慣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詞，对立的事物，无原則地結合起来。这种无原則的結合，就是混合，就是調和，就是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的混合論，調和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結合論根本不相容的。折衷主义的混合論和調和論不分敌我，不分階級，不分是非。例如現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根本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軍隊，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衷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不要斗争的調和論、混合論，如有人就不搞階級斗争的，他們对不法資本家不批評，不斗争，敌我不分，你們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了表現很不老实，一个黨員职工批評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給經理知道了，經理就找这个黨員談話，批評这个黨員說：“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这样斗，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位經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別人有缺点，見到有損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評，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人不讲是非，不讲思想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无原則暂时团結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調和論，就是修正主义，但臭气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稜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辯證法。折衷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还对，那样也好。他們慣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辯證法，这样就容易打

“馬虎眼”，容易偷梁換柱，混水摸魚，容易欺騙群眾。例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篇文章里批評折衷主義的時候說：“把馬克思主義偷偷換回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證法是最容易欺騙群眾。”

如有人說：“我既不是單純業務觀點，也不是單純政治觀點，在我那個單位里，既突出政治，也突出業務，這才是全面觀點，光強調突出政治或者突出業務，都是片面的。”他這種講法，初聽起來好像滿有道理，考慮的很全面，既照顧了政治，又照顧了業務，但仔細想一想，是徹頭徹尾的折衷主義，它不過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現，它賣的是完完全全折衷主義的貨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眾，蒙蔽群眾。

第四個特點有折衷主義傾向的人總以為自己很有政治。其實他的腦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憐。這些同志所謂很有政治，充其量不過是“口號在嘴上，保證在紙上，決心在會上”而已。他們在小聲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話為名，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話聽去了，於是緊跟着高喊“要突出業務”，好象不這樣做，就很不舒服似的。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難政治幹部，突然感到奇怪。

第五個特點是哲學上的折衷主義，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投機主義、修正主義。因為他把政治與軍事、政治與經濟、政治與業務、政治與技術的關係搞錯了，把靈魂抽去了，其結果就一定是：小則只是業務觀點，大則陷入修正主義泥坑。

以上講的是折衷主義的五個特點。凡是有折衷主義觀點與傾向的，他們都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從他們的思想深處來說，是反對突出政治的，是不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直政紅旗戰鬥隊翻印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

(1965年)

一、階級鬥爭與哲學的關係：

有階級鬥爭才有哲學，學哲學的應當下去，今冬明春下去。身體不好的死不了，多穿點衣服就行了。大學文科這樣搞法不成。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不成，書本怎能出哲學呢？馬列主義有三部分，科學社會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基礎是科學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想說服資本家，發善心不行，要依靠無產階級鬥爭。

研究哲學的人，第一是哲學？不是，第一位不是哲學，是階級鬥爭，因為有壓迫者，被壓迫者就要反抗找出路。從這一點出發才有馬列主義，才找到了哲學。文科大學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動，動一些也可以，其他統統下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法律、歷史的統統下去，教授、助教、行政人員一起下到農村五個月，到工廠五個月。看一看，得到感性知識，現在總可以看到土地、房子、馬牛羊、雞犬豕、稻稞菽、麥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至少可以看到土地和人，搞點階級鬥爭。那是一個大學，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什麼人大、北大，我就不是大學生。我是小學教員、中學教員，綠林大學。過去讀孔夫子書，讀六年，相信他，讀資產階級書讀七年，學資本主義一套。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信康德二元論，過去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過書。後來才搞革命，參加了黨。只知道要革命，革什麼，怎麼革法，不懂，學了十三年，學點文化，反帝以後才了解的。今冬明春，分期分批下去，去參加階級鬥爭，才能學到階級鬥爭，學到革命。下去無非是鬧

点伤风感冒。知識分子，天天坐在机关，住的好，吃的好，穿的好，也不走路，所以鬧伤风感冒。……不搞階級斗争，搞什么哲学，下去搞搞看，不好再回来，有人搞資本主义也可以，現在社会上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資本主义，不是太单調了嗎？不是沒有对立統一只有片面性了嗎？讓他們去搞，上街游行，我都贊成，因为社会很复杂，沒有一个人民公社不分为二，过去搞四大自由，过去搞民主革命，分配封建土地，搞个体經濟，还是資本主义范畴。后来有人提出包产到戶，这就是搞資本主义。我們搞了这么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可以收买人，更不用提要地主女儿了。問題不少，关于哲学材料收到了，資本主义怎么讲的，修正主义怎么讲的，馬列主义怎么讲的，这三种主义都搞上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問題上犯了錯誤，是对六亿人口的錯誤。不讓我們革命，夺取政权。我們准备了多年，从抗战开始。請同志們看看文件，都讲任务，新民主主义論是完备的綱領，政治、經濟都讲了，只是軍事沒有讲。新民主主义讲的，无产階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有些外国党，軍隊、农村、政权都不搞，这是陈独秀那一套。我研究了十八年农民問題，一九二四年在讲习所研究了這個問題，同別人談了話，在过去沒有党是自发的階級斗争，誰懂得馬列主义，只知道拿枪搞革命。过去好多事，我們沒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會議沒有听，后来搞整风，搞历史就是沒有听。社会把我們推向了历史的政治舞台，誰想过馬列主义，教条主义不研究中国的特点，到农村不研究农村情况。一九二五年开始，我研究了十几年（农村）。

富兰克林說：“人是創造物质財富的动物。”馬克思說人是社会的动物，还是思想的动物，人是万物之灵。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要从进化的观点看問題，人至少經過了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腦和双手，我就不相信只有人才有双手。将来动物就不发展了？只有一种猴子才能进化？牛馬羊、犬、猪就不进化了。地球原来是死的，后来，氢和氧結合才有水，以后才产生了万物。所以人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研究不成，要讀些书，为需要而讀書，有知識很重要。

二、关于分析和綜合問題：

分析和綜合有許多哲学家讲不清，历来分析和綜合就讲不清楚，分析讲得比較清楚，关于綜合我想讲几句話，現在只讲概念的分析和綜合，不讲客观。

过去我們搞过国共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无非是多少力量，多少黨員，多少根据地，多少武器怎样，多少人，大城市多大，我們有延安，他們有上海，延安七万人，上海有几百万人。他們长处城市大、有外援。人多、兵多，武器好，但兵是抓来的，官兵对立，当然有些人能打仗，不是一打就垮。我們的长处是联系人民。过去他們編了歌罵我們，綠眉毛，紅眼睛，杀人放火样样都干，反而給我們做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問爸爸，共产党怎样？他爸爸說，长大了就知道了。又問他叔叔，他叔叔說，再問我就打你。豈不要相信反动宣传，那时候听了反动宣传就不相信，要用階級观点分析比較，研究历史不研究階級斗争是弄不清，只要用階級斗争观点才能清楚。紅樓夢我看了五遍，就是当历史看的，不受影响，有人說第四回不必要看，其实第四回是总綱，四大家族都交待了，統治者不过二十几人。

怎么綜合，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对立面，他們軍隊来，我們一块块吃，把他一块块吃掉。不是楊献珍的合二而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他們是不要和平共处的。我們就一块

块吃掉，因為他們要吃掉你，不然為什麼進攻延安。你有你的自由，你的軍隊來，我能吃就吃，不能吃就走。他們全軍消滅了不就綜合了嗎？劉戡幾萬人進攻，結果被打死，就綜合了。軍隊被俘虜，願留下的就留下，不願發路費就走，把武器拿過來，不就綜合了。遼沈、平津一戰，傅作義四十萬大軍沒有打，不就綜合了嗎？大魚吃小魚，一個吃掉一個，二個對立統一，有一個主導方面，一個吃掉，一個就綜合。

這些問題從來也沒有人罵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都沒有寫過），我的書也沒寫。楊獻珍講合二而一，不可分割的聯繫，世界上有什麼不可分割的聯繫，有聯繫最後一定要分割，沒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從生活講，人天天吃飯，吃蔬菜，沒有吃馬牛羊吃的草，而吃大白菜，為什麼不能吃砂子，神農嘗百草，經過分析，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經過分析，達到南方人吃蛤蜊，北方人不吃魚。

三、關於社會發展問題：

恩格斯的辯證法有三個範疇，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我就不信後二個範疇。三個並列就是三元論，不是一元論。基本東西是對立統一，質量互變是對立物的矛盾轉化。沒有什麼否定之否定，奴隸否定原始，對封建是肯定，封建對奴隸是否定，對資本主義是肯定。怎麼綜合，原始社會作為一個制度，和奴隸社會並存，但主體是消滅原始社會。社會發展有許多階級，開始是男人服從女人，以後女人服從男人，這段歷史弄不清楚，要有百萬元，真正有階級社會五千年，一個消滅一個，一個推翻一個，一個階級消滅一個階級，社會興起，社會都不是很純的，看主體是什麼，資本主義也是不純，再先進的資本主義，也有封建殘余，如美國南方還有奴隸制。總之一個消滅一個，從發展如此，任何東西都是如此。看到孔夫子還了解，地球上的人就住不下了，死了人應當開慶祝會，應當慶祝辯證法的勝利。莊子老婆死了，敲盆而歌唱。發生、發展到消滅，一個消滅一個。最初國民黨想消滅我們，結果被我們消滅了他們，一個吃掉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也要死亡，不然共產主義怎麼來，共產主義也不是一個辦法，幾萬年不變化？辯證法的生命力不斷地走向他的反面，萬物總是發生、發展到消滅，恩格斯說的，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自由是對必然的理解和改造，但有理解還不行，還必須對客觀有改造，對客觀弄清楚了，加以改造，才能自由，辯證法的生命力走向反面，人類最後滅亡，產生更高級的東西，說人類滅亡，有人很恐怖，我想那時，人類可向更高級發展了，將來就那么自由，北京有一萬輛公共汽車，東京有八十萬輛，因此車禍很多，我們沒有，莫非是對汽車司機教育的好，幾萬年之後還是一萬輛。列寧說，要搞空中交通，我也曾說過，我獎勵空中飛人，坐上就走。我不相信，共產主義，不分階級，不發生質變。列寧說，凡是可分，原子可分，電子也可分，現在科學家研究原子分裂成質子，中子都分裂了，電子還沒有分裂，但总有一天要分裂。莊子說：一尺之垂，日取之半，萬世不竭。”這是真理。事物是發展的，無限的，如有竭，就沒有科學了。所以說，科學家百年之後，這是有事可做，總是要提出新東西，不然要我們有什麼用。（完）

附件:

林 副 主 席

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 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

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对毛泽东同志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广。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接見高等軍事學院、 政治學院和總政治部宣傳部負責同志時的談話

對毛澤東思想抱什麼態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就是要抓對毛主席的態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特別是政治學院更應該這樣。其他院校和一切教育機關也都要這樣。

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統一行動綱領。全世界誰也不能代替毛澤東思想。什麼李達，康斯坦丁諾夫，尤金，都不行。這些人的書怎麼能同毛主席的書相比？現在全中國、全世界沒有那一個人的著作能統一人們的思想。馬克思、列寧的書太多，讀不完，他們離我們又太遠。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我們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是革命的教科書。要徹底把毛澤東思想貫徹於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用毛澤東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現在全國都在學習人民解放軍，都在學習毛主席著作，形勢和從前不一樣，局面也不同了。我們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學不好不行。許多事情都要軍隊參加，如四清、文化大革命、生產、群眾工作，還有許多幹部不斷轉業到地方工作。因此，軍隊應該真正成

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現在要真正落實，把思想搞通。幹部住校學習，就要學好，不能有名無實，要真正把毛澤東思想掌握起來。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無產階級的最高真理，是最現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理論是幾十年革命實踐的總結。學好了，幹部水平提高了，革命精神就能振作起來，就能把毛澤東思想、黨的方針政策貫徹下去。

現在全國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中央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更高地舉起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提出了全黨全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問題。全黨全國學習毛主席著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部隊、院校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有新的考慮，必須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勢，要盡最大的努力，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真正掌握起來。

你們學校明年招生，離現在還有三個月。今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通過文化大革命，把組織機構搞得精幹一些。寧肯人少一些，也不要壞傢伙。把組織整頓好，把教學隊伍整頓好，這個問題很重要。不把組織整頓好，思想不一致，甚至有壞人插在里边，怎麼能搞好？一定要提高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要嚴厲批評那種對毛澤東思想估計不足的傾向。

有些人迷信洋教條，總覺得蘇聯比我們好，近的不香遠的香，說什麼山溝里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他們那一套那里比得上我們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那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些人說《資本論》是理論的基本陣地，其實《資本論》只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問題。我們國家，資本主義已經打倒了，現在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規律問題。反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設社會主義，就是要靠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要把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高高的。要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全國的思想，進一步促進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資本主義的根子，防止修正主義。黨的八屆十一中

全会很重視学习毛主席著作，現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进入了新阶段，出現了新局面，新形势。

我們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有这种民族自卑感，就会喪失革命斗志。有人說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我們不如洋人。其实，中国人到了外国，人家也是把我們看作洋人。有些中国人在外国比洋人还洋，學問都很高。洋教条的观点，土教条的观点，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洋人、古人那里有毛主席高？那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現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归根到底，現在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出現了新局面。军队要更进一步抓紧，更讲求落实，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部队很可能有人认为，这几年搞得差不多了，搞久了就麻痺了。如果这样，就容易抓得不紧，学得不好，貫徹不好，就保持不了过去的朝氣。

我們军队打仗，历来靠人的政治覺悟，靠勇敢。这就要靠政治教育，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部队。部队战斗力的高低，取决于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抓得紧不紧。部队的紀律好坏，作风好坏，能不能出干部，能不能多出好人好事，千条万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是第一条。人的覺悟提高了，勇敢也有了，积极性也有了，創造性也有了，組織紀律性也有了，吃苦的革命精神也有了。全軍工作情况虽然很复杂，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在这一点上，又复杂又不复杂，又有差別，又沒有差別，总的就是都用毛泽东思想統一起来。

明年怎么搞，总政宣传部要研究，各院校要研究。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出現了新的形势，我們军队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新的阶段，搞出新的局面，要适应文化大革命这个新的形势。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時間，你們去研究。

干部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些同志在部队里尽搞那些事务性的东西，一天忙到黑，那有那么多時間讀書？他們到学校来，就是要讓他們坐下来讀書。如果不讀毛主席的书，就要脫离理論，就要脫离方向。具体怎样搞法，你們自己去研究。可以办几个月的訓練班，十个月、八个月也可以。

高等軍事学院，政治学院，那些路子好，那些路子不好，要研究。

我过去曾經說过，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部队干什么学什么；学校与部队不同，学习時間长一点，內容可以多一点。要通讀与选讀相結合，通讀与专题相結合。可以有三种办法：一种是按专题学，一种是完全按順序学，一种是通讀与专题相結合。時間长的采取通讀与专题相結合，時間短的不通讀，或者搞半通讀，选讀一些同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需要結合得紧的毛主席著作。究竟用那一种办法，要根据学习時間来决定，反正不要走过場。一期两个月、四个月的不搞通讀，七个月、八个月的可以搞通讀。時間长的可以搞通讀，但重点要放在专题上。要有重点，不要搞平均主义。讀書和做事，都不能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合辯証法。一定要讲究效果，不搞形式主义。要把这几年的經驗总结一下，怎样才学得好，才能真正理解、熟练运用毛主席的思想，看那种形式、方法效果好，就采取那种形式、方法。現在，对毛主席思想不是学不学的問題，而是真正学到沒学到、会用不会用的問題。

通讀和选讀的关系，你們怎么解决的？時間长的可以通讀，但重点要放在选讀上，平均主义不行。有些人有閱讀能力，有学习的习惯，又有時間，也可以让他通讀，不然他不放心，怕丟掉了什么。

要列出几个专题来作为重点。有些文章如作战命令，浏览一下就行了，重点文章就要多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要学几十遍才能学懂。

部队里就是结合实际学，今天学这篇，明天学那篇，时间久了，就差不多通读了。有的要反复读，读好多遍，有的读几遍。还是干什么就学什么，有目的地学，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学。用得上的学了就容易懂，容易记。例如，搞财贸工作的，学习毛主席关于财经问题的著作，就学得懂，记得住，用得上。不结合实际学，就学不懂，记不住，用不上。理论联系实际是根本原则。总之，重点是结合实际选读，同时又有通读。连队更要结合实际选读，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个别人愿意通读也可以，但不要作死规定。

老三篇虽然是战士必读的，但是干部也要读。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做到。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干部都要学，包括我们这些人。从中央副主席到每个支部的每个党员，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思想革命化。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学习也很重要。

《解放军报》要很好掌握，要很好突出毛泽东思想，联系部队实际，指导好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反复教育，反复宣传。看起来部队是不变的，实际上干部、战士都在变，天天都在变。要反复宣传，结合新的形势，用新的语言反复宣传，就不觉得枯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反来复去就是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一结合实际，就一点也不觉得重复了。这样宣传，形式上不重复，内容上是重复，只有多次重复才能加深认识。

今天我提出的问题，你们回去研究。全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全党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适应这个新形势，新阶段，部队特别要学好。部队一定要贯彻毛泽东思想，抵制修正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加强革命化，提高人的觉悟，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思想方法。

总政宣传部编的要战士熟读熟记的《毛主席语录一百条》，可以搞，这也是有重点的选读，不过更突出重点，更精练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上课的政治课，是不经考试的考试。群众运动就是政治，就是最好的政治课。这话是毛主席说的。我也说过类似的话。

今天就谈到这里，一两个月以后，还可以再来谈一次。

1775008



A. N. U. LIBRARY